

弦歌不辍：小吉浦往昔

据解放日报 1958年的1月末，零下8摄氏度的天气，在上海市区北郊，人们正冒着大雪挥锹。

这是来自第二军医大学组织的开河部队和来自周边部队、学校、江湾镇、高境乡的农民和下放干部等千余人。他们的身上已经被飞雪覆盖成白色，却依旧争先恐后地“在冰冷的河滩挖泥，奋力挑土”。

有感于前一年发生的“北郊地区淹没一万多亩农田”的内涝灾害，这个冬天，尽管在大寒时节，人们依旧跳入河中，计划在春天到来前疏浚走马塘、小吉浦、界凌浦、桃浦等六七条河，“合计有五十一万土方，其中由驻沪部队负责修浚的就有二十万土方”。

其中的小吉浦，长约7公里，如今位于逸仙高架路东侧。作为杨浦区与宝山区交界的界河，它曾是连通郝桥港即南泗塘至江湾机场浜的干河。

在上海密布的水网中，比起许多知名的曲水浜或江河湖荡，小吉浦的名字并不为人熟知。

在经历1958年大寒时节军民合力的艰苦疏浚后，近半个世纪的光阴里，“小吉浦”三个字一次也未再出现于上海的各种新闻中。

直到即将进入新世纪的当口，此时的小吉浦由于水体流动性不足、周边城市化程度高、自净能力弱和其他历史原因，淤塞严重，渐渐丧失航运功能，河边渐渐多出许多违章建筑。小吉浦再次进入市民视野，是因为上海市政府决心把它列入市级黑臭水体重点整治对象，并逐渐拆除河边的违章建筑。

根据新闻报道，2000年，市住宅发展局和杨浦区政府联手根治大武川地区（位于杨浦区西北部，与虹口、宝山交界，总占地面积299.5公顷）严重积水问题。当时，新建和改建三门路、吉浦路、武东路3条道路，建造排水能力达每秒19.76立方米的雨水泵站一座，输水能力达每秒0.88立方米的污水泵站一座，污水不再排入小吉浦。此后，水务部门、杨浦和宝山两区一直持续联手，致力于让小吉浦焕新。

2020年6月，一则社会新闻报道，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高境派出所接到市民来电，称在河道内发现了“神奇动物”。原来，当天上午有居民在小吉浦河道抓龙虾，一网下去却捞上来一条娃娃鱼，娃娃鱼被转交给区农委工作人员处理。在接受采访时，周边的居民都说，随着小吉浦河道水质环境的改善，经常会有人到河里垂钓、放生。这条河滨水清岸绿的景象，已经有目共睹。

经历约70年的疏浚—淤塞—整治，见证超过25年的水环境治理，这条曾经明珠蒙尘的小河，就这样带着它吉祥的名字，作为亲水观景带，重新回到市民的眼前。

不过，关于小吉浦的历史，或许可以再往前推一点。

上海是通江达海的江南重镇，其中的江湾地区，在史书中的一次高光“亮相”，和南宋抗金的黄天荡之战有关。

在南宋建炎年间，大将韩世忠曾经驻军江湾，此后西进至镇江，伏击金兵，打响黄天荡之战。韩世忠，字良臣，绥德（今属陕西省）人，行伍出身，御西夏有功，任偏将时曾参加镇压方腊起义。宋金战争起，随宋高宗南下，升至浙西制置使。

据虹口区志记载，韩世忠屯兵江湾时，将中军大帐设在保安寺内（该寺毁于1932年一·二八抗战）。近900年前的这段历史，虽然已经消散于时光中，但这场艰难的战役让江湾一带至今留下许多韩世忠的历史传说。

江湾北边走马塘，是一条从嘉定南翔经宝山入江湾的大湖泄

洪支流，昔称钱家浜、钱溪，因韩军在此走马操练，其水流经江湾地区部分得名走马塘。韩军部分家属屯垦于江湾，人口渐增，形成集镇。韩世忠死后，被宋孝宗追封为蕲王，谥号忠武，清顺治年间在江湾景德观右侧曾建有韩蕲王庙（即社神祠）。此外，因为韩世忠插过军旗而留下的旗桩石，排兵布阵而留下的阵势桥，设置驻兵厂而得名的厂头镇（大致属于今普陀区桃浦地区），无不记录着这段南宋抗金的历史。

在《厂头镇志》中，还记录了当时韩世忠因为入夜处理军机要务，厌恶帐外众蛙鸣声不止，因此“随手拿起笔来，蘸朱砂洒向蛙群，从此厂头附近的青蛙头上都生有红色的斑纹”。另一传说中，韩世忠驻兵厂头，夜间部署用兵，蛙声不止，妨碍了传令，韩世忠即向蛙承诺如不叫就予以嘉奖，蛙声顿止。过不久有一只蛙来讨赏，韩即以朱砂笔在头部点了一下，从此厂头的蛙头都皆生有红斑纹。久经沙场的老将军，对蛙鸣也感到难以忍受，可见当时他心理压力之大。

小吉浦也跻身这一系列故事中。相传韩大将军的士兵扔出草鞋，因此走马塘东出往北流去的小吉浦边有过“草鞋墩”。

靖康之耻让宋室南迁，金军第三次南下深入长江地区，攻破建康，直逼临安。宋高宗赵构一度南逃至明州（今宁波），又乘船逃往温州，此时整个江南地区都危如累卵。而黄天荡一战，暂时安放下南宋，偏安长江以南，保住半壁江山的格局。因此，对江南的居民来说，韩世忠的存在意义重大。除了官方的封王立祠，江湾地区的居民自发将传说中的驻兵之地改名留存，也是为了记住韩世忠。

小吉浦河道不宽，波澜不兴，但河道东侧，从南至北，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夜大学（逸仙校区）、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上海财经大学附中、复旦大学江湾校区、复旦二附中等知名高校、中学都相距不远。

其中的交大附中，位于历史上的高境庙地区（今高境镇），百年前曾是广东岭南大学办的上海分校。

前身为1888年创办的广州格致书院的岭南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大学之一。1928年，岭南大学上海分校在杨树浦荆州路405号选定校址，1935年，迁入高境庙新校舍。《申报》1935年的广告记录了那个日子：“本校……今于二月八日迁至江湾高境庙新址。”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逼近江湾，“在隆隆炮声中，岭南分校全体住校教师 and 家属开始撤离，几天后，上海解放。李任龙校长率全体师生再返高境庙，敲锣打鼓，欢迎南下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文工团进驻校园。”“岭南分校走进了新时代，开始招收附近工农子弟入学，学生人数大增。1952年，因办学经费困难，岭南分校被上海市教育局接管，组建了上海幼儿师范学校。1963年，幼儿师范迁出，交大附中迁入校园。”（《高境庙的“岭南”记忆》，读史老张）

读史老张还记录了另一件事：岭南分校迁出后，荆州路405号被电通影业公司借用，并在此搭景拍摄了著名左翼电影《风云儿女》。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电影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壮烈激昂，传唱千里，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就像所有的河流终究会汇入海，所有发生在上海的故事，也以自己的方式交相辉映。

在一代代师生的弦歌不辍中向海流去的小吉浦，曾经倒映过多少青春洋溢的脸庞？如今，这条河流继续流淌在上海市区的北端，吐纳着当今师生们创新进取的气息。 ■沈轶伦



红杉林

■新华社发（四姑娘山管理局供图）

我国新增两处世界地质公园

据新华社 记者15日从国家林草局获悉，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第224届会议上，我国浙江常山和四川四姑娘山顺利通过会议审议，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至此，我国世界地质公园增至51处，分布在全国24个省（区、市）及香港特别行政区。

常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浙江省

衢州市常山县，面积1043.10平方公里。公园保存着新元古代至新生代的连续地层，是亚洲东部近10亿年地质演化历史中地层序列最连续的地区之一，拥有大量笔石、三叶虫等古生物化石。

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内，地处青藏高原与四川盆地过渡

地带，面积2764.01平方公里。公园以松潘—甘孜造山带“西康式”褶皱、“西康群”浊积岩复理石建造、青藏高原东缘极高山群峰以及独特的冰川地貌为主要特色，记录了所在地区从古特提斯洋演化到青藏高原东缘隆起的地质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全球对比意义。 ■黄杰

中国文物“回家”路仍漫长

据解放日报 170比0！4月13日，经过6小时辩论，法国国民议会一致通过一项简化文物归还程序的法案。接下来，法案及其修正案需在6月底前提交参议院再次审议，一经通过即可立法生效。

这被视为法国殖民文物归还领域的里程碑——首次以“框架法”取代“逐案立法”，为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获得的文物建立整体归还机制。从非洲多国文物，到中国圆明园流失文物、敦煌藏经洞文书，均被纳入潜在范围。这是否意味着“流落”法国的中国文物离“回家”更近了？

有条件的转折点

作为前殖民大国，法国在文物归还上一直行动迟缓。一个关键卡点在于法律规定公共馆藏“不可转让”。文物归还必须逐案立法“破例”，程序复杂、周期漫长。

转折出现在2017年，刚上台的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表示，非洲文物不应只留在欧洲，并承诺5年内推动归还。这是法国首次在总统层面正面触及这一议题。不过，随着非洲国家持续发出归还请求，“一事一议”的方式越来越跟不上节奏。最终，法国选择换一套思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李庆明指出，从不同角度，法国此次立法，都是殖民文物归还领域的里程碑事件。

法律层面，法国首次以“框架法”取代“逐案立法”，这是对《文化遗产法典》中“公共财产不可转让”原则的首次系统性松动，意味着文物归还可以批量推进；话语层面，议会辩论中明确使用“非法占有”“剥夺”等表述，实质承认殖民掠夺的不正义，标志着法国政治精英层态度松动，具有“话

语解放”意义；程序层面，文物归还从“一事一议”的个案立法，转向“一类一策”的分类处理，大幅提升制度容量。

不过，李庆明也提醒称，短期来看，这更像一个“有条件的转折点”，象征意义仍强于实际效果。

实质门槛依然存在

国民议会这一关过了，但立法还没走完。接下来，法案还要重回参议院再次“过堂”，立法程序才算收尾。但程序之外，更关键的问题是——谁来决定“还不还”。

法国文化部长佩加尔说得很直白，法案设计了一套严格控制的程序，以确保“任何缺乏依据或可能危及国家藏品安全的请求，都不会迫使法国作出积极回应”。换句话说，门虽然已打开，但钥匙仍握在法国手中。

除了主观意愿，法案在制度上也设下不少“关口”。归还要求谁能提？只有国家、博物馆、部族、个人都不算主体。审批程序怎么走？要过两道关：先由双边科学委员会评估，再由法国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拍板，而主导权基本都在法方。

李庆明指出，法国的机制创新值得肯定，但并没有真正赋予原属国“归还权”。形式上的门槛确实降低了——程序简化、周期压缩、决策层级下移，但实质门槛依然存在。

先看举证责任，请求国需证明文物属于“非法占有”，对19至20世纪文物来说，溯源要求极高；再看科学审查，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标准尚未明确，存在主观裁量空间；接着是保管承诺，法案要求请求国承诺“公众可及性”和“防止再次流失”，可能引发主权敏感问题；最后是排除范围，军事文物、私人藏品以及1815年前

文物被排除在外，使大量争议性文物仍游离于机制之外。

文物“回家”有多远

长期以来，流失文物无法“回家”一直是个公认的国际难题。关键原因在于现有国际规则“管不到过去”。

近年来，随着一些前殖民国家加大历史反思，文物归还逐渐升温。德国、荷兰陆续归还大批文物。中国同样也有文物回归进展。“十四五”以来，已有500余件（套）流失文物回国。

李庆明指出，从国际上看，法国属于“先行者但非领导者”。在立法化、行政化方面，比立场保守的英美积极；但在范围广度和执行速度上，相较德国、荷兰并没有全面领先。

对中国而言，“最新法案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点。”李庆明说。

制度上，它使得圆明园文物、敦煌文书等长期“悬案”首次获得官方追索通道，有望援引法国国内法进行权利主张，改变过去“外交协商、舆论施压”的单一模式。

话语上，法国议员公开援引法国文豪雨果提到“归还中国文物”，为中国提供了道义和舆论筹谋。中方据此要求法国政府将承诺转化为具体案件，形成“法律—外交”联动压力。

国际上，作为文化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法国的立法行动对日本、英国等持保守立场的国家形成压力和外溢效应，也为中国推动多边文物归还机制提供先例支持。

总体而言，“机会窗口已经打开，但并不意味着正义会自动实现。”李庆明提醒，文物要真正“回家”，还得在科学溯源、法律论证和外交谈判三条线上同时发力，把法国的承诺一件件变成现实。 ■安峥